

# 德国女性主义研究的批判性反思<sup>\*</sup>

王凤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B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4-0039-05

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精彩纷呈,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譬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等,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关注差异、解构、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sup>[1]</sup>

在德国,女性主义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最终被“纳入了阶级斗争学说”。<sup>[2]</sup>在《妇女与社会主义》(1878)中,倍倍尔断言,妇女解放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最近十年,在具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取向的德国报刊杂志<sup>[3]</sup>中,女性问题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甚至可以说“当代德国没有女性主义,尤其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sup>[4]</sup>当然,德国并未完全忽视女性主义研究,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女性主义研究文献。例如,《男人与女人,和女人与男人——现代性中的性别差异》、《性别思维与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一起的妇女解放?——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当前社会科学中的性别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相容的抑或亲缘的?》、《女性主义》、《远方来信:今天对女性主义规划的要求》、《性别:没有感谢!》等。德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一起,共同讨论了很多问题。这里以德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为主,尤其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女性主义研究为主,对有关研究进行反思性探讨。

## 一 性别思维模式问题

在澄清“妇女”、“男性”、“性别”概念的基础上,德国学者M. T-施泰恩豪尔(Margarete Tjaden-Steinhauer)区分了性别思维的三种模式:

第一,父权制的性别概念。自15世纪末以来,德国就有了水平越来越高的“家谱学研究”,并最终掌握了充分的文献学标准。弗雷费尔特(Ute Frevert)指出,在德国,抽象的、无对象的性别概念“在18世纪早期还处于优先地位”,<sup>[5]</sup>但至少自18世纪以来的基本模式就是“妇女……生孩子(并需要保护),男性……是养育者和保护者”。到19世纪20年代,妇女被赋予了新的特性“爱情的代理人”。<sup>[6]</sup>19世纪末,妇女获得了“有尊严的地位”,以及“广泛的影响圈”即“男性的城市、妇女的家庭”。总之,在父权制的性别概念中,妇女与男性在性别特征方面,在生理、心理、社会组织等所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而且妇女总是低于男性。

第二,自然的性别概念。M. T-施泰恩豪尔指出,与父权制的性别概念不同,在自然的性别概念中,男性迸发出超父亲的功能,并将性别结果转化为性别关系。就是说,妇女像男性一样被看作是独立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08BKS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反思·批判·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08JJD710024)的阶段性成果。

的性别，两者共同代表着不可消解的关系，即性别关系。这样，妇女就与男性一样，只是两种不同的性别而已。

第三，女性主义或社会结构主义的性别概念。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女性主义理论，试图抽走“妇女社会从属性”的理论根基——从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使用中接受的抽象的、空洞的、被抬高为“核心概念”的性别概念，以及相应的性别关系概念。在美国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中，“性别被理解为结构”、“两性被理解为秩序系统”；<sup>[7]</sup>而在德语世界中，性别被解释为社会阶层的中心参照点，基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将两种“社会的”性别区分开来——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并承认这两种群体的差异；与此相应，“性别被说成是结构性范畴，性别关系被说成是社会结构关系”。<sup>[8]</sup>这样，女性主义的性别概念就使人——作为没有从传统的虚构的性别思维中突围出来的个体的“妇女”和“男性”——的现实生命力呈现出来。

## 二 性别关系与性别意识形态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否不必关注妇女状况？德国学者C. 费舍尔（Christna Fischer）指出，几十年来，许多理论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在这些理论中，核心概念是‘性别关系’和‘再生产’概念”。<sup>[9]</sup>

第一，在《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不稳定的理论：当代女性主义论争》等文本中，英国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M. 芭蕾特（Michele Barrett）预设了两个前提：（1）女性被压迫是一个普遍的事实；（2）不能仅仅从理论层面解决女性被压迫问题。在她眼里，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现行教育体制是性别意识形态产生的途径。因而，“对M. 芭蕾特来说，性别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与保持女性被压迫的主要手段。但妇女本身也再生产性别角色，并且似乎自由地构建为隶属的主体。”<sup>[10]</sup>

第二，M. T-施泰恩豪尔也特别强调性别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父权制的性别概念和自然的性别概念，它们的解释模式建立在家庭人际关系基础之上，西方文明制度关系迄今还被打上父权制烙印；而女性主义解释模式不再把社会视为（内容空洞的抽象的）总体。M. T-施泰恩豪尔认为，也许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权的暴力被打上社会关系的烙印，“孩子”及其“母亲”处在这种关系中，准确地说处在这种关系的中心。这种关系必然转变为“父亲”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他对孩子和妻子具有支配权。这个历史形成过程与在父权制家庭中的父亲拥有支配权的特征一样，被虚构的性别和性别关系掩盖着。在这个交换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样，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就——通过假定性别和性别关系的虚构是绝对不能从中逃离的、普遍存在的假象，并使性别和性别关系处在“社会结构特征”中——摆脱了父权制的权力关系。“这里有一个现实的社会暴力关系被意识形态掩盖的（肯定未被注意到的）特别的理论文献”<sup>[11]</sup>，不过，即使在这个研究中，“也显露出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sup>[12]</sup>

第三，在《女性主义历史批评辞典》中，德国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F. 豪克（Frigga Haug）<sup>[13]</sup>指出，性别关系必须像生产关系一样被分析，即性别关系也是生产方式。她认为，妇女不仅是父权制的牺牲者，而且是父权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而，妇女运动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蔡特金关于妇女问题与妇女政策的看法是成问题的。不过，如果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就能够明白，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因为她们既与工人运动又与妇女运动相争论。

## 三 性别与种族、阶级问题

性别与种族、阶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研讨。

第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社会学家M. 密斯（Maria Mies）就描述了“家庭妇女化”

(Hausfrauierung) 概念——这个概念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劳动的“去价值化”(Entwertung),也内含着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政策。在《妇女、种族和阶级》一书中,女性主义学者 A. 戴维斯(Angela Dawis)主要讨论种族主义与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妇女与阶级斗争问题。这表明,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阶级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关于性别与阶级的关系,根据 M. 芭蕾特的概括,大致有四种观点:(1) 性别不是阶级关系的独立要素,而是完全融合在阶级关系中。因而,家庭所有成员的阶级地位主要取决于男性家长——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家庭内部的利益冲突,以及妇女的职业地位等。(2) 等级制的性别劳动分工成为独立于阶级分工的压迫机制——这种观点包含在父权制的分析中,主张性别分工先于阶级分工;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两个独立的结构。(3) 性别不平等与阶级不平等相互强化,因而,性别与阶级问题不能通过对职业和收入不平等的经验数据统计而得到解决。(4) 性别分工与阶级结构结合在一起——女性被压迫因阶级不同而具有很大差异;工人阶级的男性与女性同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女性被压迫在于作为工资劳动者与家务劳动者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sup>[14]</sup>因而, M. 芭蕾特强调,必须从历史角度分析性别与阶级问题,充分注意到妇女与阶级结构的双重关系。

第三,美国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 N. 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试图借助于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思想阐发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时批评马克思对妇女状况的忽视。她认为,妇女的共同利益超越了阶级界限——她们能够争取得到近乎阶级立场的女性主义特殊认识立场。到 20 世纪 90 年代, N. 哈特萨克又强调政治斗争,甚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为此,她校正了自己原有的“视角女性主义”立场,并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她指出,没有超越阶级、超越教育程度、超越民族性、超越人种的统一的女性主义“视角”。

第四,社会学家 M. 吉门兹(Martha Gimenez)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性别盲”:“不论资本家是男性、女人,白人、有色人种,年轻人或老年人或者总是什么,对资本主义功能方式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sup>[15]</sup>与 F. 豪克不同,她认为,性别关系不能与生产关系相提并论,只要它是由生产与再生产共同决定的。性别之间不平等的原因“不能到男性的意向和动机中寻找”。对资本主义来说,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可是作为意识形态适合于遮蔽剥削关系。因此,女性主义斗争与女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联系在一起。

#### 四 家务劳动与父权制反叛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问题进入女性主义研究视野,应归功于加拿大女性主义科学家 M. 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和意大利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 M. D. 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等人。<sup>[16]</sup>在《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中, M. 本斯顿关于“妇女阶级被压迫源于未付酬家务劳动”的观点,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建议,引发了家务劳动争论:(1) 家庭内部未付酬家务劳动生产什么?(2) 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或者两者都不是?(3) 工资是什么?工资换取的是什么?<sup>[17]</sup>在《妇女与社会颠覆》(1972)中, M. D. 科斯塔在 M. 本斯顿观点基础上试图证明,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因而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组成部分。“通过理论创造概念,她想将家庭妇女嵌入工人阶级与革命斗争中。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她把家庭妇女的斗争,如在罢工形式中的斗争……视为决定性的事件”<sup>[18]</sup>。

由 M. D. 科斯塔建议的“家务劳动计酬”讨论一直持续进行着。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与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种统一的理论》(1983)、《女性问题: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文集》(1995)中,美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 L. 沃格尔(Lise Vogel)运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框架分析了妇女在家庭中未计酬家务劳动的性质及其与现存社会的矛盾关系和变革的可能性。在《经济学:女性的崛起》(1986)中,

B. 贝格曼 (Barbara Bergmann) 分析了家务劳动的评估方法。不过,通过“家务劳动计酬”实现女性解放的建议引起了保守党如基民盟 (CDU) 的攻击,也引起了“左翼党”成员如 C. 米勒 (Christa Mueller), 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批评。

第二,如何实现女性解放?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反叛父权制?或者同时向两者开战?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不同的答案。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认为,妇女被压迫源于私有制,因而,通过克服私有制、使妇女进入公共社会劳动就能实现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如 M. 本斯顿、M. D. 科斯塔等人试图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或“家务劳动计酬”来实现女性解放。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如 S. 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则认为,人类历史是性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通过生物学的技术革命才能将妇女从生物性的生育压迫中解放出来。

法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 C. 德尔菲 (Christine Delphy) 将父权制描述为资本主义系统之外的独立的剥削系统,认为女性被压迫源于家庭生产方式与父权制剥削方式。因而,她批评马克思主义很少从经济视角观察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女性被压迫。这样,她就与抛弃了父权制政治的法国共产党拉开了距离。“由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中被忽略了……在劳动市场上男女之间的明显不平等,依赖对妇女家务劳动的剥削。”<sup>[19]</sup> 尽管家务劳动平分表面上是双方个体行为的结果,但背后隐藏着父权制组织。

## 五 女性主义研究评价问题

在《与马克思一起的女性解放?——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2008)中,德国学者 C. 费舍尔 (Christna Fischer) 指出,马克思详尽考察了殖民主义、宗教、文化、住房关系等问题,却很少关注妇女劳动及其状况问题。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工人运动理论家,如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等人的出发点是,妇女问题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克服而自动解决。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妇女歧视。

第一,在德国学者 H. P. 布伦纳 (Hans-Peter Brenner) 对 C. 费舍尔的评论中,有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1)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性别盲”问题。H. P. 布伦纳指出,所谓“工人运动理论家的出发点是,妇女问题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克服而自动解决”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歪曲的阐释。鉴于 C. 费舍尔这个令人奇怪的题目,人们或许必须回忆一下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导言中的观点,即妇女总体上经受双重关系:一是对男性世界的社会依赖。尽管这可以通过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而被减弱,但并没有被克服。二是对男性世界的经济依赖。在这里,一般妇女与无产阶级特殊妇女,同样存在于无产阶级的男性世界里。当然,在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出现的妇女,并没有真正理解彻底变革的必要性。

(2) 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问题。H. P. 布伦纳基本认同 C. 费舍尔的这个看法,即“当代德国没有女性主义,尤其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并肯定地说,1989年之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研究几乎不存在”<sup>[20]</sup>,但1989年之前的联邦德国 (BRD),已经有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萌芽和教材,那时的民主德国 (DDR),有国家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活动。民主德国的妇女政策和女性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就是妇女就业促进计划,几乎90%的妇女参加了职业生活。

(3) 关于“马克思主义复兴”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复兴”的关系问题。C. 费舍尔要求,“马克思主义复兴”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复兴”联系在一起。H. P. 布伦纳说,这个要求是“缺乏实质内容的”<sup>[21]</sup>。因为“复兴”要求的前提是,人们应该知道,应该“复兴”的东西是什么?但

事实上，人们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二，H. 贝伦特（Hanna Behrend）评论说：其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妇女被歧视、奴隶化、被遗忘、无尊严状况，没有任何作用”<sup>[22]</sup>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其二，帕克英格勒的论述全部是西欧北美的女作家，但没有解释为什么省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原因或许在于：一是那些国家没有公开的女性主义者，二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托洛斯基式厌恶。三是，女性主义理论如此复杂，非学院派几乎不能把握<sup>[23]</sup>。“这些困境表明，马克思主义复兴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但 F. 豪克诊断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孤独性’最终没有预见到这一点。”<sup>[24]</sup>

### 注 释

[1] Maria Pachinger, Sozialistischer und marxistischer Feminismus. Positionsentwicklungen in den 35 Jahren. In: *Marxismus* Nr. 27, Wien, 2005, S. 15.

[2] 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与现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 例如，《马克思主义杂志》、《我们的时代》、《青年世界》、《新德国》、《具体》、《红狐狸》等。

[4] Marta Kokoschko, In einer Gesellschaft ohne Ausbeutung bedarf es keines feministischen Erklärungsinnsterns, Der soziale Inhalt der Frauenfrage. In: *RotFucks*, Maerz 2008, S. 10.

[5] [6] Ute Frevert, *Mann und Weib, und Weib und Mann. Geschlechterdifferenzen in der Moderne*, Muenchen 1995, S. 51, S. 46-47.

[7] [8] [12] Margarete Tjaden-Steinhauer, Geschlechterdenken und Ideologie,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75, September 2008, S. 127, S. 128, S. 130.

[9] [10] [15] [18] [19] [24] Christna Fischer, Frauenbefreiung mit Marx? –sozialistischer und marxistischer Feminismus. In: *Marxistische Blätter*, 03/2008, S. 87, S. 90, S. 92, S. 89, S. 88, S. 93.

[11] U. Vogel (Hrg.), *Was ist Weiblich–Was ist Männlich? Aktuelles zur Geschlechterforsch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Bielefeld, 2005.

[13] F. 豪克（Frigga Haug），德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汉堡大学经济与政治系退休社会学教授，《论据》杂志编辑出版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编撰人之一，《女性主义历史批评辞典》主编，“批判心理学论坛”成员，“DIE LINKE”成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著有《角色理论批判及其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应用》（1972）、《教育与社会生产：角色理论批判》（1977）、《关于妇女形态的女性教育 I：日常视角与女性社会化理论构想》（1984）、《超越女性受虐狂：回忆、劳动和政治》（1992）、《女性的性别化》（1999）、《向卢森堡学习》（2004）等著作。

[14] 参见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08，第94-95页。

[16] 据 L. 沃格尔介绍，早在 1940 年，美共党员 M. 英曼（Mary Inman）就已经研究了家务劳动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仍然被左派所忽视。M. D. 科斯塔不仅创立了第一个女性主义组织“Lotta finimista”，而且用《妇女与社会颠覆》（1972）一文引发了“家务劳动”讨论。

[17] 参见 L.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女权理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5期。

[20] [21] Hans-Peter Brenner, Natuerlich mit Marx! – Diskussion des Beitrages von Christna Fischer. Frauenbefreiung mit Marx? In: *Marxistische Blaetter*, 05/2008, S. 102.

[22] Hanna Behrend, Marxismus und Feminismus-inkompatibel oder verwandt? In: *UTOPIE kreativ*, H. 109/110, S. 162.

[23] 帕克英格勒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自出版以来就几乎未引起媒体注意。F. 豪克的《女性主义历史批评辞典》在德国几乎未引起实质性的预告或批评性书讯，但却受到国外女性主义者的欢迎。当然，资产阶级将它攻击为不完善的和错误的。

[25]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214-215.

（责任编辑 强乃社）